

# 论语



心读精解

陈开先著



人  
民  
大  
学  
社

心读精解

陈开先著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王 萍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湖 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心读精解/陈开先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 - 7 - 01 - 008675 - 0

I. 论… II. 陈… III. ①儒家 ②论语-译文 ③论语-注释  
IV.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3908 号

### 《论语》心读精解

LUNYU XINDU JINGJIE

陈开先 著

人 人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37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08675 - 0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前 言

孔子，中华文明史进入轴心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他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文明进入了她的哲学觉醒与突破时期。这一时期同时产生的思想家还有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等，并为我们留下了《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墨子》、《荀子》以及《诗经》、《尚书》、《春秋》、《左传》、《易经》、《易传》、《礼记》等一大批历史文化经典。中华文明的轴心时期，以汉武帝“罢黜百家”为标志而归于终结。此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治文明建构，使华夏文明的根本精神不断遭到扭曲，并最终导致整个文明精神的堕落。对于这种堕落，古代中国的士大夫们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反抗，并试图通过重回轴心文明时期的方式，进行文化拯救。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抵抗住西方文明在近代对华夏文明的进攻，并在20世纪初摧毁了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信心。

从20世纪初开始，华夏民族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开始了对自己文明传统的声讨与批判。孔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声讨与批判中所遭受到的非议与责难是最多的，以至于至今都难于消除孔子在大陆部分年轻一代心中的负面印象。伴随着21世纪中华民族崛起的脚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开始逐步恢复，我们已经



# 论语

## 心读精解

到了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社会过分神话孔子的做法，确不可取。但无中生有地责难孔子，以误读与歪曲的方式对孔子进行所谓的批判，显然也是十分不公平的。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移情式理解孔子及其思想，用“与古人神交”的心态来学习孔子思想，并用中国传统先贤的生命智慧，来理解并解释我们当下的生活，从而找出解决我们当下生活困境的办法。我们坚信：中华文明的传统并不虚无，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心态调整正确，我们就一定能够从我们的历史经典中发掘出生命智慧来，并以此来发扬和光大我们的文明传统，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华夏民族应有的贡献。

关于本书，笔者还有以下几点说明：

### 1. 关于“心读”

现代西方解释学认为：阅读与解释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而积极的相互作用，即一种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围绕着一个共同关心话题而全副身心参与的谈话游戏。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一次阅读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中国前贤所讲的，阅读乃可“与古人神交”，就是在此意义上讲的。

“神交”的前提，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人格平等，所以用崇拜的眼光或用批判的眼光来进行阅读，都不可能真正进入“神交”之境界。在中华民族的阅读史上，虽然对《论语》的阅读最为广泛，但真正能够做到与《论语》文本作者进行“神交”之阅读，可以说是鲜之又鲜。自汉董仲舒以后，《论语》就肩负起了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责任，人们对《论语》的阅读，也就或多或少



地带上了孔子崇拜之情结。而近代以来，孔子又为中国文化传统承担了封建、专制、腐朽、保守、落后等的恶名，使得人们对《论语》的阅读，又带上了批判与苛责的眼光。

我们今天是否可以用一种平和而真诚的态度来阅读《论语》，做到既不溢美亦不苛责。把孔子及其言行的记述者当做可供交谈、学习与平等对话的对象，以《论语》为平台，通过对《论语》的阅读，实现我们与孔子及其弟子们之间的真诚交流与对话，进而达到与他们共同分享生活与生命智慧的阅读目的。本书之名取为“心读”，则是在此意义上讲的。“心读”的目的，就是要回到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通过与孔子及其弟子们之间的基于生命相契的真诚交流，最终达到穿透文本及时间隧道而把握那个时代人们生活与生命智慧的结果。

“心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生命领悟之过程。此领悟不仅是对《论语》文本字面语意之领悟，也是对文本作者及其他所记述之人物——孔子及其弟子们人生历程之领悟，更是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领悟。只有领悟，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只有准确理解，才可能拥有解释《论语》文本的资格。毋庸讳言，笔者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一种与孔子及其弟子们之间生命契合的人生体验。但我的这种体验是否为真？还是需要交给所有本书的读者去评判的。

## 2. 关于“精解”

“解”者，解读也。解读即为诠释，主要指对孔子思想之诠释。之所以取名“精解”，就意味着本书在规划设计之初，我就为自己规定了如下目标：



# 而人論語

## 心讀精解

(1)精心。所谓精心，就是要求自己能够以学术之真诚来面对文本，始终保持自己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的学术良知。因为任何文本解读都只能够是解释者的当下解读，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解读者的生命关切，并且一定是解读者生命的当下关切。也就是说“六经注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精心之解要求文本的解读过程，必须守住学术良知的底线，不可以借着古人的口去信口乱说。为了避免信口乱说的情况发生，笔者要求自己对文本解读的每句话，都要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既不盲从迷信，也不主观武断。用心去体验《论语》文本中的生命智慧，并将体验到的生命智慧展示给读者，是本书写作的最根本要求。

(2)精当。对《论语》文本诠释的文献，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如果深陷于文献的泥淖，可以说是皓首莫穷矣！如何可以让自己的诠释脱颖而出？本人必须在解释之精当上狠下工夫。所谓精当，主要是指文本解释的可接受性。前人对《论语》的诠释，必然受前人生活方式之所限，故而未必能够引起当代人的生命共鸣。经过近200年欧风美雨的洗礼，当代中国人的知识背景、生活方式与生命关切，都已经与前辈的中国人有了根本区别。故而我们今天的人读《论语》的生命感受，更加容易被当代的华夏儿女所接受。所以只有当代的中国人，通过真心对话之方式从《论语》文本中捕捉到的生命智慧，才更容易引起当代中国人的高度共鸣。在我看来：评价文本解释精当与否的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与认同，读者是本书的最终裁判官。

(3)精深。所谓精深，就是试图通过文本诠释而揭示出孔子



思想背后的哲理来。汉、宋对《论语》文本的诠释，皆有拘泥于文字之嫌。如何跳出“汉宋轮回”的怪圈，而直指《论语》文本背后生命智慧之真谛？好在近百年“言必称希腊”的哲学训练，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洞穿文本直指生命智慧之幽径。本书用“精神家园”来诠释“里仁为美”、用“生命契合”来释“仁”、用强弱两分的生活逻辑来解“忠恕之道”、用自我的二重设定来解释“克己复礼”、用“尚贤”来诠释“学而优则仕”等，都是本人试图揭示出孔子思想背后哲学的一种尝试。同时，在文本解释的过程中，笔者也通过语义分析、语境分析以及语用分析方法的使用，彰显自己的分析哲学训练。

(4)精细。为了避免文本解读过程中的狂妄与武断，笔者主张尽可能地还原生活，即通过语境还原的办法，找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生命契合。对于一些实在无法还原语境的文本段落，我尽可能地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其相关语境罗列出来，以供读者选择。譬如：对《宪问》第七章“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的解读，由于语境不详，本人就从政治、教育与亲情的三种可能语境，分别对本章加以解读。而对《宪问》第三十四“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章的解读，也是通过将“怨”解析为民怨、积怨与怨恨，尽可能地让语义清晰，从而体现了文本解读的精细特征。

(5)精炼。钱穆先生《〈论语〉新解序》指出：“《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而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如果说1700多年前何晏《〈论语〉集解》所反映的汉魏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下，对



《论语》生命智慧的一种理解与领悟，而800多前朱熹的《〈论语〉集注》，则是在“佛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两宋学人从《论语》文本中读出的生命智慧。而近代又经历了百余年的“西学东渐”，我们能否在新的知识与生活的背景下，从《论语》中获取指导我们当下生活的生命智慧？钱穆《〈论语〉新解》显然指向此目标。本书亦自然指向此崇高之目标，能否遂愿尚待社会检验。钱先生觉得：适合当代人读的《论语》解读之文本，全书篇幅当不超过30万字。我却觉得，以20万字篇幅更为合宜。故不炫博，乃本书的有心之追求。

### 3. 关于“版本”

平日里读《论语》，对版本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关注。本书的初稿写成后，曾拜求几位师友帮我把关，后反馈给我最为一致的意见，就是版本问题，这才引起我对版本问题的极度注意。按照编辑的要求，我本欲选择一较为权威的版本，譬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论语〉集注》或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后发现杨伯峻《〈论语〉译注》在当代已经十分流行，故就选择该本子作为本书的基本文本依据。部分章内容的分与合，我则根据本书解读的实际需要，做了些许调整。

我以诚惶诚恐的心情将此书奉献给我们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愿它能够为我们这个饱受磨难的民族的文化复兴，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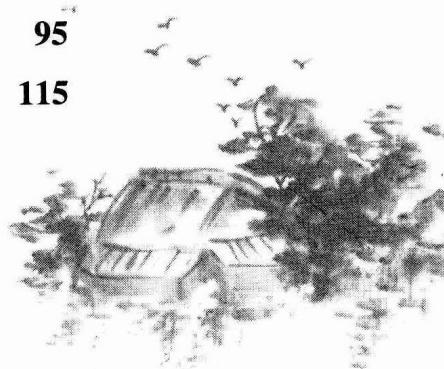
2009年仲夏陈开先于广州



# 目 录



前 言	1
一、学而	1
二、为政	21
三、八佾	41
四、里仁	59
五、公冶长	75
六、雍也	95
七、述而	115



八、泰伯	141
九、子罕	157
十、乡党	181
十一、先进	199
十二、颜渊	221
十三、子路	251
十四、宪问	287
十五、卫灵公	325
十六、季氏	357
十七、阳货	375
十八、微子	401
十九、子张	417
二十、尧曰	439
后记	448

一、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章可分以下三层来解读：

(1) “学而时习之”何谓？关于“学”，汉儒强调其“觉悟”，故许慎《说文解字》云：“学，觉悟也，从教从门，门，尚朦也。”这样学的意义主要指领悟，学者对生活的领悟。而宋儒则更强调学的“效”之意，即强调人的先觉与后觉之区别，后觉者必须依赖先觉者的引导，方可达到对生活与生命的理解与领悟。孔子身处于春秋末的历史乱局之中，为了拯时济世，提出了以“仁爱”为特色的救世主张。为了让当时的社会能够认同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有教无类”，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并缔建了华夏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团体，进而成就了一种以教或学为业的生活方式。有趣的是：古印度的六大“沙门”，以及古希腊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代表的学术团体，几乎同时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诞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

孔子这里言“学”，应主要指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至于“时习之”之“时”，传统之解释有三：①时年，既是指人应该适时而学，在适合学的年龄时段去从事为学之业；②时令，指为学者应该适应时令之变化，来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譬如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射等；③时律，指依据自然时律之变化来安排学者一天的学习生活，譬如晨诵、昏息、静

夜思等。而至于“习”，朱熹认为：习者如鸟，小鸟学飞，须数数反复。即是指初学做人者，对生活有了领悟，就必须去反复实践之。由此理解，“学而实习之”是在说：致力于学的年轻人，不时对生活能有新的领悟，即他生活的知识能够有所增长，他的人生境界能够不断获得提高。当时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身边，主要学习做人，即提高道德修养，其次再学习从政之本领。从做人的意义上讲，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就反复去实践它，并能够不断地给弟子们带来人生境界的提升，孔子说这种生命与生活之状态，无论对于教者还是对于学者而言，不都是一件十分令人愉悦的事情吗？

(2)何者为“朋”？通常以“同类”释之，或加释为“志同道合”者，皆未尽其意。从生活意义言：我们个体的人，是被抛入一个以血缘为基本关系的世界之中。除父母、兄弟、姐妹外，与我们生活中交道最多的便是朋友，他们是一些虽然与我们没有血缘之亲，但是在情感上与我们总是能够相知相通，并保持一份生命牵挂之人。生命契合乃是朋友关系的最根本特征，由于生命契合的原因，所以朋友间心灵相通，情感相依，在生活中相互扶持，情感上相互慰藉，命运中相互牵伴。正是朋友间有这种生命相依的感觉，所以才让久别重逢的朋友会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生命快乐。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指的，就是这种生命愉悦之状态，它完全无法用“幸福”之类的词来加以描述。

由于孔子当时采用的是弟子们“从其游”的教学方式，师生们便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生命共同体，但又不断有弟子被推荐出去从政，进而离开此生命共同体，于是他们共同游学

# 人論語

## 心讀精解

的人生经历，便使他们有条件成为“生命相契”的朋友。这些朋友们有可能天各一方，但仍会相互信任并保持着一份牵挂，所以当他们有机会相聚的时候，那种发自心底的欢愉，便会成为他们人生的最美好记忆。亦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关于“君子”，可作如下解析：①政治君子，一般泛指行政官吏，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行政官员。孔子之前，所有行政官员的职位基本上都是世袭的。他们在身份上位于君王之下，供君王调遣与使用，负责管理人民生活与社会事务，即为君子。而为君子们服务，由君子们驱使与供养的人们，则称为小人。所以原初意义上，君子与小人仅是指社会身份与分工，并不具有道德的褒贬意味；②生活君子，主要是贵族成员之间的称谓，尤其表现在贵族妇女对自己丈夫的称谓。所以《诗经》中大量“君子”之称谓，乃是年轻妻子称自己的“郎君”，相当于后来的所谓“官人”；③道德君子，在孔子之前，人们对行政官吏是否亦有道德操守上的要求，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子的一个文化创意在于“以德行释君子”，即将“德配天命”思想中对于君王的道德要求下移，希望通过行政管理人员道德素质的办法来改善社会治理，以最终改变社会的“礼崩乐坏”之局面。但孔子发现：要想通过提升行政管理人员道德素质的办法来改善社会治理，借各诸侯君王之手，似乎根本没有可能。于是孔子决定，通过自己率先行动的努力，来向社会展示自己政治理想的美好图景。正是这种原因促使孔子以民间办学的方式，打破官僚系统对文化和教育资源的垄断，即孔子以“有教无类”的方式，开辟了华夏民族民间



教育之路，从而为社会底层出生的普通民众，打开了一个通往社会上层之士阶层的缺口。孔子所进行的，便是“仁人君子”之教育。其教育目的，就是要为各国诸侯培养预备官员，这些预备官员首先应该具备“仁人”的道德情操，进而具备必要的政治行政能力。所以，孔子的弟子们，大都走上了为政治服务的道路，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从孔子游学的弟子们，有些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而获得了在政治上的名与位。但也还有一部分弟子，没有这样的幸运以获得他们所追求的功名。但在孔子看来，这些不幸运的弟子，如果能够保持一种平常心，不因为自己的命运不济而“愠”，而感到生命焦虑，而去怨天尤人，这样也已经达到“君子”的要求，不过此君子只是指在道德上对君子的要求，而非指现实中具有建功立业机会的君子。

**2. 有子** [有若，孔子晚期弟子] 曰：“其为人也孝弟 [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由于当时乃处于“礼崩乐坏”的历史大变局之中，“犯上”与“作乱”在社会上十分流行。诸侯们对周天子政治权威的蔑视以及大夫们对诸侯权力的觊觎，对反映社会身份等级秩序之“礼”的僭越，都是“犯上”的表现。而频频发生的“弑



君”事件，则是人们普遍“作乱”的明证，犯上作乱的流行表明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要挽救社会之危局，必须从人性与人心处救起。拯救人心必须提倡仁爱，而这种仁爱又必须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可能孔子就是从人们对其父兄之爱的亲情中，提取了“仁爱”思想的灵感，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亲情之爱乃人类一切爱之情感的真正源头。故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人们只要具有珍惜亲情，关爱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的正常情感，一般就不会去做犯上作乱之事。君子要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就必须从培养自己的孝悌之情感做起。君子有了自己的孝悌之亲情，才会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面向崇高的人生目标，进而内化出自己的做人原则来，即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是想通过倡导“仁爱”，来拯救已经趋于崩溃的社会秩序，这是孔子救世的基本思路。孔子的这种思想是否符合实际，在现实中是否能够行得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所强调的秩序背后的那种温馨之爱，是一种蕴涵着普世意义的人类之大爱。而这种爱乃是人类的一种极为稀缺且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发掘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资源。

### 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此点上存在严重分歧。西方文明尚辩，认为善于言辞，能够以语言征服他人者，为社会之佼佼者。而中华文明起码自孔子起，对能说会道者就没有好印象。